

从秦安馆藏镜看铜镜纹饰的变迁

张元元

(秦安县博物馆,甘肃天水 741600)

[摘要]中国古代铜镜自从铸镜工艺成熟以后,产生了一些与时代同步的纹饰。通过镜背纹饰不但可以区别其时代,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艺术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对各个时期铜镜纹饰的分析与对比,梳理了中国铜镜文化发展的大体脉络。

[关键词]秦安;铜镜纹饰;铜镜文化

[中图分类号]K8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0-0019-03

铜镜亦称铜鉴,是古代人们梳妆时观容照貌的用具,也是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铜镜一般有正、反两面,正面平而光滑,为照面之用,背面为浮雕装饰面。一般来说,可以通过铜镜背面的纹饰来判断其制作时代,因为纹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状况。中国铜镜的纹饰与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紧密相关。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着明显不同的形制及纹饰,青铜镜也一样,其制作思想都与时代同步。

一、早期铜镜纹饰

到目前为止,经科学发掘出土的铜镜,最早的是齐家文化镜。这一时期的铜镜很可能处在中国铜镜的起始阶段,



图1

铜镜体积小,镜背纹饰属于不规则的几何造形,体现了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发展水平(图1)。从其镜背纹饰中,可看到同心圆的凸棱,间以放射式复线纹。同心圆凸棱的制作,可能来自陶车在阴模上车

削。复线纹是在阴模上手工刻制,显示出不规则性。

二、商、周铜镜纹饰

商晚期到西周,发掘出土的铜镜数量十分有限。从目前能见到这一时期的铜镜纹饰来看,基本上是照搬青铜器表面主纹的纹饰。从形制看,这一时期的铜镜没有得到规范化制作,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镜钮,镜缘与镜面一样平。与青铜器的纹饰制作技术一样,也是在背面制作的纹饰。所以,镜背纹饰也都是高出基体面的,其纹饰显示出手工在范面直接操作的不准确性。河南安阳小屯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多圈凸弦纹镜,直径11.8厘米,厚0.2厘米,

重200克。背面中心饰桥形钮,钮外为六周凸弦纹,弦纹之间填密集的竖直短斜线纹。西周铜镜早期纹饰多为素面,中期之后少量铜镜出现几何纹,到了后期铜镜纹饰出现了鸟兽纹。

三、战国铜镜纹饰

战国时期是中国铜镜技术发展的成熟期。战国镜第一次统一了铜镜的形制及合金,其合金第一次达到了含锡量为20%以上的高锡青铜,其形制的标准是内凹式卷缘、三弦钮、地纹上叠压主纹。从战国青铜器的表面可以看到纹饰中有许许多多小方框式的铸造披缝。这些披缝说明,战国青铜器的纹饰是采用了单位纹饰范拼兑技术。战国时期的青铜镜,也采用了相同的纹饰制作技术。所以,在战国青铜镜的背底纹中,不论其主纹是什么样的造型,都可以在其底纹中看到单位纹饰范拼兑技术留下的一个个方框式披缝。所以,战国镜的主纹饰也一样具备其时代特征。四叶镜,圆形,钮为三弦钮,双重圆钮座,羽状纹为底纹,由钮座向外均匀伸出四叶,形状为桃形,素底卷边。在图2中,左边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右边是鄂州市博物馆的藏品。绿色的部位,就是一个完整的单元纹饰,底纹都是由这样的单元纹饰拼兑而成。采用单元纹饰拼兑技术,是战国镜的普遍特征。



图2

四、两汉铜镜纹饰

西汉初期,青铜时代结束。由于战乱刚刚结束,在文、景两朝休养生息的宽松政策下,铜镜开始逐渐进入市场。此时的铜镜尺寸一般较小,如日光镜、照明镜等,这些铜镜的背纹都是采用了机械制图的原理进行纹饰的制作,具有较规整的几何造型纹饰。秦安县博物馆馆藏的一面日光连弧纹镜(图3),直径7.4厘米,重60克。镜面圆形,圆钮,圆钮座,座外有内向八连弧纹一周,钮座与连弧纹边由八段线条相连。外区为铭文带,饰有“见日之光,天下大明”八字,镜缘为素宽带平缘。



图3



图4

东汉时期是中国铜镜制作技术发展较为辉煌的时期。经过200年的发展,东汉早期铜镜纹饰从较为简单的几何造型发展到线雕艺术,继而又发展到浮雕艺术,给唐代铜镜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安县博物馆馆藏有一枚七乳纹带镜(图4),圆钮,圆钮座,钮座外环绕着九个小乳,内区饰七乳间线雕四神及禽兽,凸宽带边缘,中饰流云纹及锯齿纹。东汉中期以后,镜背纹饰由线雕逐渐发展为浮雕,如各种神兽镜,也发展为平雕,如各种画像镜。

五、唐代铜镜纹饰

唐镜纹饰是中国古代铜镜纹饰中艺术水平最高者。与汉镜纹饰相比较,汉镜的纹饰概念化、抽象化,少有写实的画面。而在唐代的狻猊镜、瑞兽鸾鸟镜、海兽葡萄镜等纹饰中,常常能见到卷起的花瓣及叶子。这是汉代铜镜纹饰无法企及的,显然唐镜的纹饰艺术吸收了西方文化艺术。下文以秦安县博物馆馆藏的一面葡萄镜为例予以说明。

(一)海马瑞兽葡萄镜的题材内容

1986年,秦安县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唐代海马瑞兽葡萄镜,直径29厘米,厚2厘米,重4500克,形体厚重,质地泛白,以高浮雕的葡萄、海马、雀鸟、瑞兽、狻猊、鸾凤为主题,以葡萄叶藤枝蔓为底纹装饰,图纹华丽,制作精良,外表美观。该镜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1992年,被甘肃省文物专家组评为国家一级文物(图5)。这枚海马瑞兽葡萄镜由镜钮、内区、外区、镜缘组成,镜面呈圆形,伏兽钮,

无钮座,镜以凸弦纹为间隔分内、外二区,内区以葡萄藤叶和花瓣枝蔓为底纹,镜中饰一俯卧兽,周边以6串葡萄环绕一圈,内区突棱边缘内侧点缀16串葡萄,颗粒饱满,高低起伏,错落有致。10只雀兽在葡萄和叶



图5

藤枝蔓间攀绕嬉戏,体态丰腴,生动活跃。以兽钮为中心,分左、右两侧。兽钮前雕飞舞的雀鸟,雀鸟后面跟着昂头攀升的海马,海马后面雕鹞鸟在葡萄叶蔓上栖息,似在啄食葡萄茎蔓,鹞鸟后面跟着俯卧的瑞兽,头作回顾状,瑞兽后面是匍匐的海马,海马的后面又是飞舞的孔雀,布局左右对称。外区同样以葡萄叶藤枝蔓铺底,在内区突棱边缘外侧以24串葡萄做点缀,在镜缘边框内侧以28串葡萄做装饰,在葡萄及藤蔓间装饰着两组飞舞的雀鸟和凤鸟,还有四组追逐戏耍的狻猊,每两只为一组。狻猊和雀鸟、凤鸟首尾衔接,以不同的动态环绕外区一周,它们各自攀绕在葡萄间,嬉戏玩耍,或蹦或跳,或卧或匍,或飞舞或翱翔,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活灵活现。镜缘边框饰一周叠云纹,镜缘是一周突起的窄线棱边,内区突棱面饰以绳索纹一圈。这面铜镜构思精妙,内容丰富,制作工艺精湛,主题及纹饰布局类似于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的海兽葡萄镜。

(二)海马瑞兽葡萄镜的纹饰特点

海马瑞兽葡萄镜装饰图案布局趋向于自由活泼,构图变化丰富,以浮雕表现手法增强主体纹饰的立体感和画面的层次感。

1.图案纹饰对称灵活

这件海马瑞兽葡萄镜分内、外两区:内区以点对称形式分布雀鸟、海马、鹞鸟、瑞兽共10个攀援在葡萄枝蔓之间;外区以雀鸟、凤鸟、狻猊共16只动物在葡萄叶藤间环绕,它们形态各异,相交辉映;葡萄以同心圆的形式分布为四圈。丰富多样的纹饰在造型艺术中突出了唐代铜镜对称形式的灵活多变及华丽灵动之感。唐代的图案纹饰处在瑞兽纹向花鸟纹及植物纹饰转变的阶段。据考证,瑞兽葡萄镜盛行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这一时期正是瑞兽纹饰向花鸟纹饰转变的重要阶段。

2.图案排列统一协调

海马瑞兽葡萄镜背面以葡萄和海马、瑞兽、雀鸟、凤鸟及狻猊为主题纹饰,首尾相接的顺序反复排列,或以瑞兽和瑞鸟交替顺序反复排列。各个纹饰形成了轻快流畅,规整统一的格调。内区围绕兽钮重复排列两组相同纹饰;镜

中为伏兽钮,前后各饰飞舞的雀鸟,雀鸟后面跟着海马,海马后面是静立的鹊鸟,随之又是瑞兽,瑞兽后面又是海马,它们各自形态相同或相似,攀援在葡萄枝蔓中。外区排列形态相同的雀鸟、狻猊、凤鸟,纹饰繁缛细致,富丽华贵。

3. 图案浮雕生动形象

海马瑞兽葡萄镜背面纹饰以高浮雕的手法表现主题纹饰,瑞兽、海马、狻猊体态各异,或匍或卧,或奔或跳。禽鸟展翅或束翅飞舞翱翔,葡萄颗粒丰硕饱满、清晰醒目。葡萄的叶藤枝蔓以浅浮雕铺底做辅助纹饰,装饰于主题动物纹之下,画面呈现出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生动形象、主体分明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六、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大体上可以对我国铜镜铸造工艺及铜镜纹饰演变发展历史有一个基本了解。春秋战国以前铜镜制作没有规范化,镜钮各式各样,镜缘和镜背面在同一平面上,没有层次之分,纹饰为素面几何纹,后期出现鸟兽纹,这一时期铜镜纹饰高出镜基,体现了范铸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铜镜数量大,种类多而复杂,质地薄而轻巧,多为圆镜,也有少数方镜,背面出现了钮座,钮的形式多样化。纹饰突出重叠式,以细线纹做底纹映衬出粗线纹的主题纹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纹饰内容丰富,有几何纹、植物纹、动物纹等。西汉铜镜出现了一些新形式,如半圆球状钮,钮座多为圆钮及四叶纹钮座。纹饰突出主纹,地纹逐渐消失,以铭文内向连弧纹为主纹,后期题材纹饰出现神兽纹,镜缘多做装饰,纹饰有云流纹、锯齿纹等。东汉铜镜题材主要以神兽镜和画像镜为主,以浅浮雕手法表现出半立体状,高低起伏,形象生动活泼。唐代铜镜制作手法清新优雅,从形式上突破了圆形方形的传统,出现了菱花形、葵花形等,钮多为兽钮。主题纹饰花鸟、植物增多,铭带消失。纹饰内容出现了忍冬、蔓草、葡萄纹样。唐高宗至唐德宗时期,铜镜纹饰以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等最为流行,这一时期镜背纹饰内容受到外来文化影响,增加了葡萄纹及海兽纹等。铜镜纹饰内容以高浮雕形式表现,瑞兽静动相间,活泼开放,错落有序。

[参考文献]

[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2]邵凤芝.两件馆藏唐代海兽葡萄镜[J].四川文物,2010,(2).

边强《甘肃关隘史》发行

《甘肃关隘史》是一部全面考察介绍甘肃古代关隘设置的专著,全书分6章30多个节目,从古代关隘的产生,到历代关隘设置的沿革变革,系统地介绍了古代作为军事防御设置的关隘在历史进程中与国界边防、道路交通、邮驿传递、屯田军垦、朝贡互市、民族融合、宗教传承、城镇起源、近代海关以及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关系。同时在宏观把握历代关隘设置的基础上,对甘肃关隘设置的地点规律、防御设置、边防战争、重大事件等作了全面梳理和介绍,凸显了以秦、汉、明三代长城,丝绸之路及民族宗教文化为标志的甘肃历史特色,并对分布于全省14个市州的400多处古关堡、隘口、城寨、遗址等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介绍。

作者边强曾任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副所长,这是他积累多年资料,并结合多年的考察活动,历时三年,为发掘甘肃历史文化遗产、弘扬地方特色所撰写的一部心力之作。全书可供历史研究、方志编撰、旅游开发等部门参考,为文物普查、古遗址保护等提供一定的借鉴,是文史、旅游爱好者透过各地关隘了解甘肃历史文化的窗口。

《甘肃关隘史》全书80多万字、600多页,为16开精装本,科学出版社出版。由原国家文物局局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吕济民先生题名,中国长城学家罗哲文先生作序,是一部全面揭示甘肃地理名胜、关隘城堡、战争事件和历史变革的力作。除文字记述外,还附有历代咏陇边塞诗词、各地古迹名胜地图及风光光照等。全书考察翔实,论述有据,语言精炼,通俗易懂,集专业学术与文化普及性于一体,既是方志编撰、旅游开发、文物普查、地方宣传等部门必备的资料库,也是导游和文史爱好者了解甘肃不可不读的工具书,还是一部爱好诗词游记写作和阅读欣赏的诗文集。

走遍甘肃,关山万重觅胜迹;一册在手,河陇事典可通晓。《甘肃关隘史》以全新的观点,向读者揭示了甘肃这个在中华文明进程中农耕与游牧文化、华夏与欧亚文化、南北东西文化相互交织的十字路口所发生的厚重历史,通过对甘肃省内的秦、汉、明长城,丝绸古道险关要隘等众多文物古迹和山川名胜的考察,讲述了在历史长河中这片神奇土地上丰富多彩的故事,为人们探索华夏文明和西部风采打开了尘封的窗口。(马玉蕪)